

# 中东欧国家周报

## 【斯洛伐克社会周报】

2019年斯洛伐克需要关注的社会发展问题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Bratislava

(2019年1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Huang Ping



## 【斯洛伐克】2019 年斯洛伐克需要关注的社会发展问题

过去的一年是斯洛伐克自 1993 年独立以来最为动荡的一年。2019 年无疑将给斯洛伐克带来一定的发展变化。2018 年大规模民众示威的余波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然而，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上升势力可能会使社会的积极动员黯然失色。媒体和教育部门的发展将决定斯洛伐克能否成为一个自由和成功的国家。另外的问题还有，处于东西方之间的斯洛伐克，其文明归属问题以及效仿波兰和匈牙利的“非自由民主”的问题。

2019 年，社会的发展将继续值得关注。2018 年无疑可以说是斯洛伐克充斥着抗议活动的一年。调查记者杨·库恰克（Jan Kuciak）和他的未婚妻被谋杀一事引发数万人走上街头抗议。这是自 1989 年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导致政权垮台以来该国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抗议者自称为“体面的斯洛伐克”（Decent Slovakia）的运动证明了斯洛伐克社会的活力。该运动的影响预计将持续 2019 年全年。不过在没有任何非常严重的导火索的情况下，2018 年 3 月和 4 月发生的那种大规模抗议预计不会再发生。新总理彼得·佩莱格里尼（Peter Pellegrini）领导的政府试图采取更温和的立场。因此，公众的愤怒至少在公开表现上有所缓和。随着社会的力量得到证明，政府将更加谨慎地避免再次引发愤怒。

在过去的一年，斯洛伐克已经表明，公众对精英阶层的怨恨并不一定伴随着破坏性和非理性的反体制潮流。相反，它可以支持该国的民主价值观念、政治环境和政治体

制。然而，斯洛伐克也不能幸免于当前欧洲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抬头的危险趋势。在 2016 年的选举中，与新纳粹有关联的极右翼政党“科特勒巴—我们的斯洛伐克”

(Kotleba - Our Slovakia) 赢得了该党历史上最多的选票。尽管新执政联盟宣称它将成为“反极端主义的大坝”，但极端分子的地位并未削弱。相反，前总理菲佐利用极端主义政党所宣称的“索罗斯阴谋”，使极端主义观点成为主流。菲佐即使在辞去总理职务（极有可能东山再起）之后仍继续支持斯洛伐克境内的极端主义和阴谋论，这使得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观点可能会进一步释放其力量。此外总统候选人之一——史蒂芬·哈拉宾（Štefan Harabin）所代表的就是支持民粹主义、反民主、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分子的反体制角色。他在民意调查中的表现持续强劲。他在选举中的可能胜利（不太可能发生的黑天鹅事件）也许会使 2019 年成为一个出现惊人逆转的年份。

2019 年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对象是媒体。正如过去几年的发展所显现的那样，媒体是民粹主义政治家的普遍目标。他们精心策划的、对媒体的不信任无疑是政治局势恶化的迹象。在整个中欧区域，新闻自由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在匈牙利，任何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媒体都被边缘化了。在捷克，总理控制的媒体在其报道中表现出明显的、一贯的偏见。在斯洛伐克，对调查记者库恰克的谋杀也许已成为对媒体攻击的最严重的象征。这一悲惨的事件本身并不能反映斯洛伐克媒体优于其邻国。尽管如此，前总理菲佐依旧不断抨击和贬低媒体，攻击他们的工作，指责他们有政治目的。毫无疑问，这使得媒体的环境更加不利。与此同时，随着人们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加深，所谓的“另类媒体”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事实上，它们往

往成为传播扭曲的、假新闻的平台，而这些假新闻往往类似于俄罗斯的宣传文章。

2019 年值得密切关注的一个具体事件是斯洛伐克国家广播电视（RTVS）的情况。自从新领导被任命以来，斯洛伐克国家广播电视的版面引起了很多争议。许多有经验和知名的记者或者被解雇，或者被迫离开，或者因为工作环境恶化而主动辞职。有指控称，与现任政府有联系的新领导层限制了报道自由，并危及了在前任主管领导下获得了良好声誉的广播公司的中立性。此外，斯洛伐克国家广播电视还引入了来自“另类媒体”圈子的人，这引发了人们对其发展方向的担忧。2019 年，斯洛伐克国家广播电视领导层的变动将值得关注，因为这是对媒体乃至国家民主方向的试金石。

2019 年的另一个问题是教育领域的发展。鉴于目前的技术和就业形式，为了成为本世纪一个成功的国家，素质教育正变得更加重要。在教育领域的管理不善将影响未来的几十年。多年来斯洛伐克教育领域缺乏系统的思考，没有进行过有意义的改革，甚至完全缺乏对教育问题的关注，这些情况使得目前的情况已变得不可持续。自从斯洛伐克 1989 年剧变以来，这种教育方式没有发生过任何根本性的改革。另外，教师薪酬明显偏低，这影响了教师群体的素质水平。在高等教育中，情况也不甚乐观。只有一所斯洛伐克大学——布拉迪斯拉发的考门钮斯大学（Comenius University）跻身世界 500 所最好的大学之列。相当大比例的大学生选择在捷克或其他国家留学，这造成了人才流失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斯洛伐克议会议长安德烈·丹科（Andrej Danko）的丑闻贬低了教育的价值。事实证明，他的学术头衔是根据抄袭作品获得的，但他拒为此绝承担任

何责任。2019年，教育部门急需严肃的公众讨论以及真正的政治意愿来进行艰难但亟需的改革。然而，短期内改善的前景并不乐观。

不变的是为确定斯洛伐克文明的方向而进行的斗争将继续。随着自由民主国家困境的加剧，欧盟长期的政治危机，特别是难民危机的余波，离心倾向日益明显。相当一部分斯洛伐克人认为斯洛伐克不是西方的一员，而是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其中俄罗斯是一个重要因素。执政联盟中的亲俄成员斯洛伐克民族党（Slovak National Party）甚至阻止了一份将俄罗斯列为斯洛伐克威胁的战略文件。在文化方面，也有部分斯洛伐克人认为俄罗斯是更受欢迎的伙伴，而不是“专制的欧盟”，后者被指责传播与斯洛伐克传统不相符和违背斯洛伐克国家利益的价值观。部分人还把目光投向邻国匈牙利和波兰，这两个国家的政府一直重视保护传统价值观和民族认同感，同时追求某种形式的“非自由民主”。大多数斯洛伐克人并不支持这种方向，但对此表示支持的声音仍然在增加。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四分之一的斯洛伐克人更喜欢一个强势的政府，而不是当前的民主体制。吸取其他国家发展的教训，尤其是在外部冲击或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斯洛伐克朝这个方向转变的可能性不能小觑。这一点在2019年同样值得关注。

（作者：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Bratislava, 翻译：张瑞琪，校对：马骏驰，审核：陈新）